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斯达尔夫人

论文学

IO
263
2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斯达尔夫人

论文学

徐继曾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B

363319

Madame de Staël
DE LA LITTÉRATURE
Considéré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

Édition critique par Paul Van Tieghem
Librairie Droz, Genève, 1959。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选收十月革命以前各时代各学派具有代表性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外国文艺理论著作或批评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论 文 学

Lun Wenxue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8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 插页 2

198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8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300

书号 10019·4031 定价 2.60 元

导 言

保尔·梵·第根

—

《论文学》一书是斯达尔夫人最早的一部巨著，但并不是她的处女作。当一八〇〇年春本书出版时，她已经在—七八八年发表了《论卢梭的作品与性格书信集》，—七九三年发表了《审判王后有感》，—七九四年发表了《对和平问题的意见——致庇特先生及法国同胞书》，—七九五年发表了《论小说》（附中篇小说三则），—七九六年夏发表了《论激情对个人与民族幸福的影响》；还不算—七九〇年少量发行的两部诗剧，以及其他零星作品。她在一七九五年付印的《关于国内和平的意见》，直到—八二〇年《全集》出版时才公开发表。她在一七九九年写了一部篇幅相当长的作品，题为《论终止革命的现实条件及在法国建立共和政体的原则》，直至—九〇四年才部分发表，—九〇六年全文问世。她所发表的作品大都没有署上真名，但上层社会以及文学界人士都知道作者是何人。除了几篇在戏剧和小说方面的幼稚之作以外，她的作品或分析现实政治问题，或论及伦理道德，或涉及文学理论或文学史；这种种思考和抒怀的题材，在作者笔下，在她敏捷的才思和奔放的热情中，是紧密联系、甚至是自然而然融合在一起的。关于完美的可能性、关于古人未能充

分描绘的真正爱情、关于神话在诗歌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的许多思想，在《论激情》、《论小说》，特别是在《论终止革命的现实条件及在法国建立共和政体的原则》中都已经提到，在《论文学》中又重新提出并加以阐发。《论文学》是作者二十岁至三十四岁之间思想的总结。在这些青年时代的作品中，一切都是以满腔的热忱写出来的；所作的论断，即使是在有理有据的时候，还是显出主观色彩，而且也并不掩饰这种色彩；作为妇女的个人情感和作为作家的见解是不可分割的。在思想和文章风格方面的这些特点，在《论文学》中依然可以看到，甚至更加突出。

论及这部作品的文学史家和评论家为数极多，他们大都很早就指出这部作品在文学史学中所提出的崭新东西；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足够充分、足够强调、足够精确地把这些东西指出来。他们对这类问题不大感兴趣，而只是把这部作品置于它的历史环境之中，置于作者一生的经历之中而已。这里有必要强调，作者把孟德斯鸠的思想体系应用于文学，认为文学紧紧依存于与其性质迥然不同的实际，这一思想是何等新颖大胆，且又是何等富有成果：以往在这方面的一些孤立的见解构成不了一种理论，而斯达尔夫人的理论是十九与二十世纪文学史进步的起源。因此，在进行一个如此独创、前途如此灿烂的设想时，许多错误和不足，都是应该予以谅解的。

当斯达尔夫人着手撰写这样一部篇幅大大增加，涉及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这类重大题材的作品时，她曾经作了哪些准备呢？为写这样一部作品，一方面对古今各国文学必须具备尽可能精确的知识，至少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以及对这些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有影响的各类条件有尽可能精确的了解。另一方面，对自文学的黎明以来，在欧洲，至少是在写作艺术取得

成功的发展的国家中接踵而来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具备同样精确的知识。因为，“社会制度”一词，作者虽因难以找到合适的字眼去代替而有意缩小其范围，却也包括政治制度、法定的宗教、社会机构与设施、风土人情及民族性格等方面。问题在于把文学与历史（不是帝王和战争的历史，而是文化和风尚的历史）这两个领域加以对照，从而找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

在文学这个范围，斯达尔夫人可以从她青少年时期所阅读的书籍中，从她在她母亲内克夫人^①的沙龙中所听到或所参加的谈话中，获得绝大部分材料。看来她几乎总是通过阅读原著或译本，来直接了解为她提供例证的那些作家。她从小就通晓英文；意大利文则是在写作《论文学》大约六年后首次去意大利旅行时才学习的。那时候，她对德文还一无所知，只是在一八〇〇年初，才在巴黎从威廉·封·洪堡^②学习这种语言。她在那年四月二十八日写信给歌德说：“两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学习德文，以便拜读您的原著”；五月二十日，她“继续毫无怨艾地学习德文”；九月十一日，她开始阅读原著。她很少利用前人发表的关于某国文学的评论作品或历史著作。而且她也没有能赶上利用让格耐^③关于意大利文学的著作、西斯蒙第^④关于南欧文学的著作、夏多布里昂关于英国文学的文章、施莱格

① 斯达尔夫人的父亲内克(Jacques Necker, 1732—1804)是出生于日内瓦的著名金融家，曾于一七七七及一七八八年两度担任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进行经济改革。内克夫人的沙龙在巴黎颇为著名。

② 威廉·封·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德国语言学家。

③ 让格耐(Ginguenné, 1748—1816)，法国文学家，著有《意大利文学史》。

④ 西斯蒙第(Sismondi, 1773—1842)，瑞士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著有《中世纪意大利诸共和国史》。

尔^①《戏剧文学教程》的译本以及后几年用法文发表的任何作品。巴兕的《文学教程》、马蒙泰尔^②的《文学纲要》、拉阿普^③的《古今文学教程》(此书最初几卷刚在1799年出版),所有这些作品,她曾列出书名备忘,但在她所走的崭新的道路中对她并不能起什么有效的指导作用:这些著作的文学观点依然纯粹是古典的、说教的而不是历史的,是静止的而不是能动的。

在结构和总的精神方面和她的作品最为接近的是意大利教士德尼纳的《关于文学变迁的演讲》(1786—1795年译成法文);这是关于古代和现代欧洲文学史的两大卷著作,其中不乏颇有意思的见解,但与斯达尔夫人的观点很少共同之处。斯达尔夫人也许从中借取了这么一点思想,那就是文学上的“伟大时代”之所以伟大,只是由于有默默无闻的漫长岁月为之作了准备,在这些岁月中知识与力量日积月累,终于突然迸发出光辉(卷三,第一章)。

至于斯达尔夫人的直接知识,在法国文学方面,除蒙田^④以外,几乎只知道路易十四时代以后的作家;她的同代人多半也对这个时代以前的文学一无所知。至于意大利作家,但丁^⑤的作品她读得很少,她似乎跟伏尔泰一样瞧不起这位作家;她对彼特拉克^⑥的十四行诗略知一二,对《疯狂的罗兰》和《解放了的耶路

① 施莱格尔(Wilhelm von Schlegel, 1767—1845),德国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此处书名应为《论戏剧艺术与文学》。

② 马蒙泰尔(Marmontel, 1723—1799),法国作家。

③ 拉阿普(La Harpe, 1739—1803),法国作家及批评家。

④ 蒙田(Montaigne, 1533—1592),又译蒙泰涅,法国思想家,散文家。

⑤ 但丁(Dante, 1265—1321),意大利诗人,中古到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⑥ 彼特拉克(Petrarca, 1304—1374),意大利著名诗人。

撒冷》^①所知较多；在马基雅维利^②的作品中，她对《关于李维乌斯^③的最初十年的演讲》中阐述的政治思想大为推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至少曾读过一七七〇年出版的兰盖^④的《西班牙戏剧》中所提供的译文。她可能是通过拉阿普最近的译本（1776年）读过《卢济塔尼亚人之歌》^⑤。她对莎士比亚非常熟悉，对他以后的英国文学的知识则更丰富。通过阅读原著或翻译，她对主要的英国诗人、小说家、史学家、哲学家都相当熟悉。她不懂德文，但对已经译成法文的德国文学是了解的，其中包括克洛卜施托克、维兰德^⑥、歌德、席勒。无庸赘言，她的文学视野仅限于这几个国家。

当她论述古代文学时，她的知识是很不均衡的。她不懂希腊文，在希腊作家中读过荷马、悲剧诗人们（多半是通过1785—1789年再版的布里穆瓦神甫所译《希腊戏剧》一书）、阿里斯托芬^⑦、品达罗斯^⑧的少量作品、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若干篇页，特

① 《疯狂的罗兰》，又译《疯狂的奥尔兰多》，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Ariosto, 1474—1533）的著名长篇传奇叙事诗。《解放了的耶路撒冷》，意大利诗人塔索（Tasso, 1544—1595）的叙事长诗。

②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 1469—1527），意大利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

③ 李维乌斯（Tite-Live, 公元前59—17或公元前64—12），古罗马共和国末期帝国初期的历史学家。

④ 兰盖（Linguet, 1736—1794），法国律师，新闻记者。

⑤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Les Lusiades），十六世纪西班牙大诗人卡蒙斯（Camões, 1525—1580）所作史诗，写的是瓦斯科·达·伽马绕好望角到达印度的事迹。

⑥ 克洛卜施托克（Klopstock, 1724—1803），德国诗人，狂飙运动先驱者之一。维兰德（Wieland, 1733—1813），德国启蒙运动时期作家。

⑦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约公元前446—385），古希腊喜剧诗人。

⑧ 品达罗斯（Pindaros, 约公元前518—442），古希腊合唱琴歌诗人。

别是普卢塔克^①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她对拉丁文似乎颇有基础,可以直接欣赏维吉尔^②和奥维德^③的诗篇,在本书中予以引用;至于西塞罗^④,她特别熟悉《物性论》、几篇演词及书信;她喜爱塞内加^⑤的伦理作品;在史学家中特别欣赏塔西佗^⑥,这个名字经常在她笔下出现。总之,她的文学知识是不完全的、不均衡的;但是她的论断,不论其价值如何,都是从她纯粹个人的印象,从她与作品的直接接触中,自发地迸发出来的,而未曾通过文学史著作或文学评论的传统见解这样一个媒介;这就说明为什么她的这些论断时有漏洞,也常有弱点,不过这也使这些论断具有清新的魅力,使我们可以从每一个论断中看到她个人的精神气质,看到她的感情和她特别喜爱的思想。

在历史领域中,斯达尔夫人也未能利用基佐在三十多年以后才发表的《文化史》那样的通史著作来扩大并弄清她对各国内部情况的知识。除了她所肯定知晓的伏尔泰的《各民族风尚与精神论》以外,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有不少作家都谈论过历史哲学;她肯定读过好些,但从中得益并不很多:她要处理的问题跟他们太不一样了。她的历史知识得自她所参考过的历史著作和人物传记者少(其中主要的,我们将在注释中加以说明),而得自反映各国历代制度、风俗、精神的散文或韵文作品者多。从

① 普卢塔克(Plutarchos,约46—120或127),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传记作家,柏拉图派哲学家。

② 维吉尔(Vergilius,公元前70—19),古罗马著名诗人,史诗《埃涅阿斯纪》的作者。

③ 奥维德(Ovidius,公元前43—18),古罗马诗人,长诗《变形记》的作者。

④ 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43),古罗马演说家,修辞学家,政治活动家。

⑤ 塞内加(Seneca,约公元前4—公元65),古罗马政治活动家,悲剧作家。

⑥ 塔西佗(Tacitus,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

她对异教思想或基督教思想、专制主义或共和政体、奴役或公民自由、妇女的被束缚或自由发展这些方面的思考特别是感怀中，引出了在某种精神与物质条件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必然与这些条件有关的论点。对每一时期和每一民族的特点，她都有强烈的，但并不总是确切的感受。她以在我们看来不够慎重的雄心，企图再现文学作品诞生时的历史的和地方的气氛。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她原应掌握十九世纪这个“史学的世纪”发表的有关这方面问题的大量著作。

至少有一个时期，也就是在她这部作品中占主要地位的一个时期，是内克的女儿通过书本以外的途径认识的：这就是王政末年和大革命时期。她的亲身记忆，她前天、昨天和今天的印象，为她提供了大量材料来就伦理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哲学的思考——这也是她或许曾经利用过的马布利教士所著《福西翁谈话录》^①一书的题材——，来评论当时的文学，并指出明天的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子。无论是通过这部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影射，或者是通过在本书第二编中的大量阐述，她都使我们看到，她所亲身经历过并对她的命运产生了那么大影响的大革命中的事件，怎样形成了这部著作中所阐述的论点的基础。

除了斯达尔夫人用来认识事实和掌握文字材料的这些来源以外，构成这部作品中心的总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关于人类思想可以无限完美的这种信念在十八世纪哲学家中间已经广泛存在；斯达尔夫人自己定下的任务是把这种信念应用于它最

^① 马布利 (l'abbé Mably, 1709—1785)，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启蒙思想家孔狄亚克之兄。福西翁为公元前四世纪雅典将军、演说家。

难以自圆其说的领域，即文学这个领域。据勒尼乌-瓦兰在他的《斯达尔夫人的精神》(1818年)一书中说，《论文学》的诽谤者们声称作者只不过是从小德斯鸠、弗格森、杜尔哥、勃莱尔博士、梅尔西爱、康德、马尔泽尔布、葛德文、孔多塞^①那里借取了这个思想。《斯达尔夫人的精神》的作者却只承认孔多塞在她身上产生的影响。的确，在其余那些人中间，有些人对斯达尔夫人的影响是很不可信的。即使是孔多塞，他的《人类思想发展史概述》也不过刚刚发表(1794年)，在他的作品中，关于文学发展的连续性这个论点，在任何一处都没有象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明确坚定地提出来。斯达尔夫人关于可以把概率计算有效地应用于社会事物和精神现象这个思想，也许是得之于孔多塞的。而在文学艺术方面，孔多塞并不象伏尔泰那样认为文学艺术在一个灿烂辉煌的时期以后必然会衰落；即使后人的才华不及前人，即使每一个作家的成就没有那么大，但是总的成果总会有所提高，因为在个人的努力之外又加上了经验的积累。在孔多塞那里也有斯达尔夫人所捍卫的论点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只是简略地提了一提，而且那部书只不过是一部纲要，而作者那种数学头脑不可能产生斯达尔夫人如此喜爱的伦理的和抒情的感怀。

人们常问，作为本书第一编的基础的文学史体系，到底源出何处？这个体系将欧洲文学分为南方与北方两组，前者以荷马

^① 弗格森 (Adam Ferguson)，苏格兰政治学家。杜尔哥 (Turgot, 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勃莱尔博士 (Hugh Blair, 1718—1800)，苏格兰作家。梅尔西爱 (Mercier, 1740—1814)，法国作家。康德 (Kant, 1724—1804)，德国哲学家。马尔泽尔布 (Malesherbes, 1721—1794)，法国政治家。葛德文 (Godwin, 1756—1836)，英国政治家，作家。孔多塞 (Condorcet, 1743—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理论家。

为鼻祖，后者以莪相^①为渊源。这种与两种文化相应的两种诗歌世界的对立观，至少在骨子里是从马莱论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那些书卷、从勃莱尔博士那篇《论莪相的诗》和前不久刚译出的《修辞与文学教程》中得来的——这里仅限于列举斯达尔夫人肯定曾参考过的作品。赫尔德^②于一七九六年在他的两篇《文学短评》中曾描述过从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的过渡；本书作者是否曾通过维莱^③或亨利·梅斯特的译文读过这两篇文章，此事大可怀疑，何况双方的论点也相去甚远。斯达尔夫人对北方各民族的性格和他们的文学的看法，跟德国青年浪漫主义者，特别是施莱格尔兄弟^④与她同时期发表的见解之间，相似之处倒更多些；然而斯达尔夫人在一八〇四年以前根本不知道他们，也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在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日的《时代报》上的一篇文章中，维日尔·皮诺曾将这个见解发展的沿革列了一个完整的，然而并不可靠的时间表。他认为，斯达尔夫人的这个见解可能是在她早就在瑞典驻巴黎大使馆认识的瑞典外交官布林克曼启发下产生的。

至于将荷马和莪相进行对比，这在麦克菲森^⑤最初的作品发表以后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哈曼和赫尔德先后阐发了这种对比。但是，如果说人们一致同意尊荷马为希腊及拉丁诗人共同之父的话，那么，却是斯达尔夫人把同样的光荣给予这位苏格兰

① 莪相，传说中的三世纪苏格兰行吟诗人。

② 赫尔德(Herder, 1744—1803)，德国文艺理论家，狂飙运动的理论指导者。

③ 维莱(Villers, 1765—1815)，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之友。

④ 指威廉·施莱格尔（见本书“导言”第4页注①）及其弟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1772—1829)，诗人，德国浪漫主义奠基人之一。

⑤ 麦克菲森(Macpherson, 1738—1796)，苏格兰作家，一七六〇年出版《莪相作品集》，实为模仿之作。莪相的原作直到一八〇七年才出版。

行吟诗人，把他称之为不仅是北方各民族的诗歌，而且也是北方各民族全部文学的鼻祖。有人说她这种体系来自维莱，但是这样的说法并不可靠：维莱只是把荷马和莪相看成是“德国的缪斯”所喜爱的楷模而已。她也许倒是受了她如此推崇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那赫赫有名的段落的影响，在那里，那青年主人公说道：“在我心中，莪相替代了荷马。”特别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莪相的诗歌中发现了一些她在英国和德国作家作品中注意到的种种人物性格：在这一点上，她的理论仍是直接从她的个人印象产生的。对忧郁也是一样，她把这看成是北方文学的主导特征；这个思想也是她个人的产物。

迪莫夫认为，《论文学》的主导思想和安德烈·谢尼耶^①十五年前所写《论文学艺术盛衰的因果》（此书的大部分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一直未曾发表）的主导思想，有着惊人的类似之处。看来斯达尔夫人并不认识安德烈·谢尼耶，她可能是在这位诗人逝世以后，或许是通过他的弟弟玛丽-约瑟夫·谢尼耶，或许是通过她的朋友弗朗索瓦·德·庞日（他在一七九五至一七九六年间和未来的《论文学》的作者过往甚密）得知他这些思想的。“谢尼耶的论文要证明孟德斯鸠的方法可以应用于文学”，照他的说法，只要去研究那些“促进”或“损害”文学的社会原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他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原计划包括一篇“指南”和一篇“对目前情况的考察”（但始终未曾写出），这又是同斯达尔夫人的作品的一个相似之处。谢尼耶的作品写得非常抽象，缺乏明确的例证，主要是对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强烈抨击；写作态度也远不是历史主义的。关于完美的可能性这个论点只是

^① 安德烈·谢尼耶(André Chénier, 1762—1794)，法国诗人，主要作品有《悲歌集》和《牧歌和田园诗集》。

隐隐约约地得到承认；当然既没有提到基督教义的积极效果，也没有提到北方文学的优点之类。迪莫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斯达尔夫人研究协会所作的一次演讲中重新细谈这个问题时，特别考察了两位作家的思想之间可能有过的中间媒介。总之，这种影响是可能存在的，但并不是肯定存在的。维莱的影响也许可以在某些方面看出来；而热朗多的影响则不可能在当时就产生。

这部作品的基本思想就是：任何文学的历史，只有把这种文学和创造这种文学的人民的社_会和精神状态联系起来，只有把它放到它当时的环境中去，才能被人理解，才能加以研究。这种思想源于孟德斯鸠，但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维柯^①，是莱辛还是赫尔德，都没有把这种思想提出来；而把这种思想应用于文学，这在一八〇〇年还是前所未有的。斯达尔夫人之所以得到这种思想的启发，完全是通过她自己的思考，而这种思想依然是她这部作品中最有独创性，最富有成果的一个成分。

由此可见，在这部作品中所表达的文学见解的来源和沿革方面，我们在绝大多数场合还只能提出一些假设，因为直到现在为止，精确地论述这些问题的学术著作还很少。

二

关于本书诞生的过程，我们还只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部书至迟是在一七九八年开始写的：谢纳多莱在他的日记里记道，

^① 维柯(Vico, 1668—1744)，意大利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学的一些原则》。

当他一七九九年春（圣伯夫^①和勃伦纳哈赛特夫人误为一七九七年，经萨米夫人纠正）在科佩小住时，作者正在写作此书。“斯达尔夫人那时正在忙于撰写她的作品，每天上午都写一章。”请注意，各章平均有八开纸二十三页以上，我们自不应拘泥于谢纳多莱的说法。“她在餐桌上，或晚间在客厅内，把她要写的那一章的论点提出来，请别人提意见，她自己也滔滔不绝地即席发表看法，到了第二天，那一章就写成了。全书差不多都是这样完成的。当我在科佩的时候，她论述的问题是：论基督教义对文学的影响、论我相对北方诗歌的影响、北方的沉思的诗歌、南方的感官的诗歌，等等……她的即席发言远较她写出来的章节出色……”这最后一点印象是所有听过斯达尔夫人以无可比拟的才气发表她随后见诸文字的思想的人们共同的感觉。一七九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她写信给亨利·梅斯特道：“您好心为我开列的那些书是不是几乎都是德文的？自您走后，我一直没有学德文了。等您下次再来，我将麻烦您看我的手稿。”她在十一月初回巴黎，雾月十八政变（公历1799年11月9日）以及以后几周当中焦躁不安的日子，这些都使她的写作速度减慢甚至中止下来，并且促使她把第二编的文字加以修改或补充。

她在一八〇〇年初将定稿交给出版商。作品于四月初版，同年底出第二版。作者的工作至此结束。这部作品的题目是如此野心勃勃，立意又是如此大胆新颖，它到底是怎样一副面目？它的内容如何？在细节方面，它给文学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恕我们借用最近几十年来德国批评界提出的一个字眼——给文学的哲学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作者又是怎样利用这个题材来

^① 圣伯夫(Saint-Beuve, 1804—1869)，法国文学批评家，强调研究作家生平经历和心理状态。

流露或者公开表达她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感情的？我们认为在对作品进行简要分析的过程中，有必要对以上各点作一番对照研究，尤其是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篇专门论述这部作品的详尽的、精确的论文。

在初版中，此书开卷是一篇长达五十六页的“引言”，作者在其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此书的两个基本主旨，并且谦逊地强调这是一个独创的见解；这两个基本主旨在书中同时予以发挥，并始终相互交织：“我的主旨在于考察宗教、风尚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宗教、风尚和法律的影响”。作者在提出要分析“改变文学精神的伦理和政治的原因”（着重点是我们加的）时，她可能无意中透露出她在研究文学的时候，不是考察它的各种形式，不是把它当作一门艺术，而是把它看成是思想感情的表现；这一点在下文的确得到了证实，但并非总是如此，只不过在绝大多数场合是如此罢了；这一点也是十八世纪的一份遗产，十八世纪更多的是一个理性的世纪，而不是一个艺术的世纪。

作者紧接着提出要研究“人类思想在哲学领域中缓慢而连续的进程”——作者所说的哲学包括各门科学在内——“以及在各门艺术领域中迅速然而有所中断的成就”。本书第二个主导思想是“完美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遭到多方非难的论点。作者然后研究“法国革命对文化产生了什么作用”，也就是研究刚刚过去的岁月，并研究“一旦秩序和自由，道德和共和独立精神在政治上巧妙地结合起来的时候，又将取得怎样的结果”。这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在雾月十八日政变前后写的。接着是关于文学在人心有萎靡沮丧之虞的悲剧性年代中的重要性及其功用的充满个人色彩的大段论述，然后是三大段关于文学与荣誉、自由与幸福的关系。这三大段的总目标似乎在于激发对文学作品，特

别是对哲学和论理著作的崇拜，把它们看成是和最强烈、最崇高的激情紧密联系的东西，仿佛由于社会变革和革命动荡而冷落了这些著作，作者对此企图有所匡救。在这些段落中，人们有时听到这位以整个身心投入党派斗争的女公民强烈抗议那“为了确立自由就得建立专制政体”这个在法国革命期间有人一再提出的口号；有时听到这位心地善良的妇女因为看到“严肃的虔敬之心不断遭到冷酷无情的浅薄的蔑视”而痛心疾首；有时听到这位热情洋溢的女读者，在读着那些“感情丰富”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也许能使一颗沮丧的心重获希望；我此刻就在读这样的作品，为它所感动，我相信我现在还能在这样的作品中找到我的泪痕”。

在紧接而来的“本书的结构”中，作者详尽论述了“由于时代的交替所造成的文化的普遍发展”这个学说，认为“人类思想的逐步前进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的”。至于完美的可能性这个思想，作者说：“由于人们在革命时代某些灾难性的岁月中从这个基本思想里引出过粗暴的推论，有些人就觉得这个基本思想十分可恶”，而这个思想，自从本书发表以后，立即为它的诽谤者提供了反对和嘲笑的材料。

第一编的篇幅远较第二编为长，它以最直接的方式解释了本书的名称和主要意图。这一编的标题是“古代和现代文学”。古代文学分成几个大的时期，但自“希腊文学的第一时期”即荷马时期这一章起，在谈了关于情感、诗歌和音乐这样一些饶有兴趣的问题以后，立即谈到雅典民主的发展及其对“杰出人才”的感情。在就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中，斯达尔夫人对社会风尚为文学家——在现代则是为女作家——所提供的地位特别感兴趣。在论及荷马诗歌的来源及其精神环境